以人性尊嚴作為台灣國家發展依歸

●李敏勇／詩人、台灣新世紀文教基金會文教人權委員會委員

首先，引用一首捷克詩人賀洛布（Miroslav Holub, 1923-1998）的詩，以一位病理學家聞名，同時也享譽捷克文學界的這位詩人，在他的作品裡面下經歷納粹德國入侵和二戰後共黨統治體制的精神史見證。

幫助的手　賀洛布

我們對草伸出幫助的手——
而它會長成麥子。
我們對火伸出幫助的手——
而它發展出火箭。
猶疑地，
小心翼翼地，
我們伸出幫助的手
對人們，
對一些人們……
（李敏勇譯）

賀洛布和捷克的一些詩人，像塞佛特（J. Seifert, 1901-1986；1984，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像東歐諸國的波蘭，匈牙利等國的詩人，在政治困阨下，不斷透過詩，以言語的善美和真實，為人性的尊嚴做護衛的努力。他們這些國家，在納粹德國入侵時和二戰後共黨統治時代，都有大量人民移民美國，嚮往的或許就是生活中的心性尊嚴。二戰時期美國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揭示的四項自由，應該是具體的表徵：「言語和表達的自由」、「宗教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

生活在台灣這塊土地的人們，即使進入新世紀改變國民黨執政，仍然沒有進入國家正常化的階段。近現代意義的歷史，台灣是在日本殖民統治和國民黨中國類殖民統治發展的歷史。沒有主體國家的人們，在殖民地和類殖民地狀況下，人性是被扭曲的。「棒子」和「胡蘿蔔」兩手策略，讓被統治下的人們委曲求全，成為物質主義和機器人。

建構台灣為一個正常化國家，台灣人，生活在台灣這個島嶼的人們才有「國民意識」，才能夠講求「國民意識的氣度」，並且談其「凝聚與展現」。這不只是統治權力的競奪，從國民黨手中獲取台灣的統治權力而已。以「選舉」做為政治改革的手段，民進黨已取得總統席位，但是並沒有改變「中華民國」的虛構、他者、殘餘的性質。國民黨苦思「光復」台灣，意味的就是恢復「中華民國」的國民黨國現象，是重新掌握它們從中國大陸綁架，流亡到台灣的「國家」，一個中國意理的國家。而其正體已經被中國人民推翻而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生活在國民黨國化「中華民國」體制下的台灣人，甚至尚未認同台灣的戰後隨國民黨流亡到台灣的移入者，在國民黨蔣體制的戒嚴時期，被綁架在「反攻大陸」的統治口號中，多少異議份子被以叛亂犯處理，蒙牢獄之災，甚至犧牲生命，家破人亡！但台灣走上民主化之路，國民黨失去絕對統治權後，特別是總統選舉失利後，走上「聯共制台」的國民黨又如何對待台灣？國民黨中國藉著共產黨中國對台灣施加的魅惑和夢魘，又如何扭曲被宰制過尚未脫離被宰制情境的台灣人？

台灣國家的正常化，意味的是建立一個獨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正常化的台灣國家。有一個正常化國家，台灣人，無論先來後到，政黨立場如何不同，才能真實地面對國家的意義，在真實上追求人性的善美。日本詩人田村隆一（1923-1998），在二戰後反思自己國家的戰敗廢墟，認為戰爭的破壞不只是城市的毀壞，也不只是許多人傷亡，而是意義的跛壞，亦即人性的破壞。因此，他認為「國家是重要的，但國家也是危險的！」。國家主義化的日本帝國、納粹德國、法西斯義大利，二戰時造成多少人心靈的破壞、生命的傷亡？在國民黨統治的戒嚴時期，台灣也曾經歷過「國家也是危險的」階段，因為那時期的黨國一體國家宰制了一切，留下許多暗夜的哭聲！追求建構正常化國家，應該是追求「國家是重要的」這樣意義的國家，是為了建構一個共同體，以保障國民的正義和安全，並維護國民的自由和尊嚴。

美國，這樣的一個國家，在獨立後也有不斷的自我革命論，尋求改造自己的國度。約翰・洛克斐勒（John Rockefeller，1874-1960）的《第二次美國革命》這本書，對於工業革命後重物質、重商業的價值觀嚴重威脅美國建國理想，為尋求重建一個重人道較物質之上的民主社會，他提出五個要素，做為人生的重要條件：1.人的尊嚴；2.歸屬；3.關切；4.每個人努力去發揮其人類全部潛力的需要；5.美。這種人性化的憧憬，更應該在台灣被提倡。

要建構台灣為正常化國家，像這樣的人性化憧憬是重要的。相對而言，以人性尊嚴作為台灣國家發展的依歸，才不會走向國家主義化的歧途，也才更能夠召喚生活在台灣的人們走上建構之路。二戰後的日本、德國、義大利這三個軸心國戰敗後的自我重建，都尋求走過意義廢墟，尋求人性的重建，因而走上戰後復甦之路。日本、德國、義大利的文化人，包括詩人、小說家、哲學家、藝術家，展現在自我重建的反思，何其豐富！

生於德國，二戰時流亡美國的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1906-1975），不斷在公共性的復權闡釋國家的意義，論述政治。這位經歷納粹德國壓迫的猶太裔，女性思想家，「自由」是漢娜・鄂蘭對「政治」仍滿懷執著的基礎。即使如此「黑暗時代」描述極權時代，這個詞語借自一位傑出的德國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一首詩的行句，她仍然認為「即使在最黑暗的時代，人們還是有期望光明的權利，而光明與其說來自理論與觀念，不如說來自凡夫俗子所點出的螢螢之光，在他們的起居作息中，這微光拖曳不定，卻照亮周遭，並在他們有生之年流瀉於大地之上」。她描述了許多文化人追尋光明的努力。

台灣應該走出被政治困阨束縛、宰制的困境，不要沉淪在下面這首詩的景況裡：

信仰　李敏勇

他
從沒有過真正的信仰
只迷信
神明的庇佑
苦苦等待上天的賜福
任何犧牲
在他看來都是忌諱
初一十五燒金紙
點香要求施捨
嘴裡唸唸有辭
灰燼污染街道
線香瀰漫巷弄
混沌一片天

建構一個國家，建構一個正常化國家，建構一個美麗、自由、公義、和平、福祉的正常化國家。這種「國家重建論」和「社會改造論」，為台灣獨立、建國，描繪新的視野。

在這樣的視野中，從「人」到「台灣人」，到「台灣國民」，以至「世界公民」，台灣人的人格發展才臻於更完全形貌。台灣的國家正常化，不只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課題；也不只是解放於國民黨國化之外的課程；更不只是政治權力的黨派競逐課題。台灣的國家正常化是人性的重建課題，以人性尊嚴作為台灣國家發展的依歸，台灣才能走出歷史的悲情，尋覓到國家的願景。◎